



茶神、茶祖和茶心：武夷茶种植文化地位论

文 张经武

【摘要】武夷茶种植在中国茶文化格局中具有源发意义和基地意义，在世界茶文化格局中具有祖源意义和中心意义。丰富的历史文化奠定了武夷茶种植之当下地位，这一地位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大红袍的茶神地位；桐木村的茶祖地位；武夷山的茶心地位。

【关键词】茶神；茶祖；茶心；武夷茶；文化地位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没有茶树，就无所谓茶叶，也就无所谓茶文化。茶树种植是茶文化之基。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分析武夷茶种植的人类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考察武夷茶种植的历史文化、当代文化和文化趋势，我们会赫然发现，武夷茶种植在中国茶文化格局中具有源发意义和基地意义，在世界茶文化格局中具有祖源意义和中心意义。

丰富的历史文化奠定了武夷茶种植之当下地位，这一地位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大红袍的茶神地位；桐木村的茶祖地位；武夷山的茶心地位。大红袍茶树代表乌龙茶、岩茶之巅峰和典范；桐木村之正山小种茶树，它代表世界红茶之祖先与根脉。这两种茶树，构成武夷山茶种植格局中的核心内容。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武夷山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茶树种植中心。

一、大红袍母树的茶神地位

大红袍母树无疑是武夷山的茶神，

它反映了武夷茶种植文化历史形成的独特格局：至尊树种大红袍母树就像神一样，它俯瞰着芸芸众生，生长而且被供奉在武夷山水间。自然造化的灵气，凝聚于这六株有着近 400 年历史的古老茶树之上。武夷山岩茶的其它品种，分明也分享了大红袍母树的灵韵。

大红袍母树具有图腾意义，它属于武夷岩茶文化最卓越的代表，是武夷岩茶文化的凝练与聚集，是武夷茶人心中的神灵。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 (J. G. Frazer) 认为：“图腾 (totem) 便是一种自然的物，野蛮人以为其物的每一个都与他有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因而加以迷信的崇敬。”^{[1]225} 野蛮人可以有图腾，文明的武夷茶人同样可以有图腾。那就是因为大红袍母树和武夷茶人之间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因为大红袍母树被赋予的精神价值，武夷茶人其实已经将大红袍视作他们的图腾。

“那些被崇拜的植物，就像被崇拜的人一样，被认为是具有特殊本领或品

格的，抑或是具有巫术模拟性质的，抑或是曾有益于人类的。”^{[2]250} 大红袍之所以具备图腾崇拜意义，是因为它有特殊本领和品格。大红袍母树上所产之茶是岩茶中的极品，它在武夷茶王国中具有至尊地位。据历史记载，生长在武夷山的大红袍有数处：一为天心岩九龙窠，其旁有摩崖石刻标记，年产不到 0.5 公斤；二为天游岩，年产约“数十小两”；三为珠帘洞，清代嘉庆年间产茶约 0.9 公斤。^[3] 但多数认为天心岩九龙窠有“大红袍”石刻标记的为正本大红袍。据考察，天心岩九龙窠上的六株大红袍母树所产之不到 1 斤的茶叶，因其冠绝天下的独特口味，因其稀缺性，历代以来不是平凡人能享用的。即使是天心禅寺亲自采摘过的僧人，恐怕也很少有亲自品茗的福分。这样的品格和身份造就了大红袍母树高山仰止的神性。

今天，大红袍母树继续生长在天心岩九龙窠之上。在那云雾氤氲、花鸟应和的半山之所，大红袍母树就如六位女

神,以流水飞瀑为友,以鸟语花香为伴,脚掩苍苔灵草,身披云霞雨露,微笑在钟灵毓秀的碧水丹山间。人们来到九龙窠下,非得仰望才能一睹这六位女神的尊容,这似乎是冥冥中神的安排。人们真的把这六株母树当作神一样看待,给予她们神一样的礼遇。不再从母树采摘茶叶,把母树当作神一样进行保卫和守护。20世纪30年代,一支部队曾专门驻扎看护大红袍。40年代以后,专门受政府雇用的农夫一直驻守九龙窠,这样的看护形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六位茶树女神和她们的崇拜者还有守护者,相看两不厌,相聚到永远,长相厮守,这样浪漫的奇观恐怕只有在武夷山九龙窠才能见到。

六株母树繁育出数不清的大红袍茶树,带给武夷山享用不尽的财富,从这一点上来说,六株母树也配得上神的地位。百年以来,繁殖大红袍树种和扩大大红袍种植规模的梦想一直被许多人追逐,陈德华便是其中一个。20世纪60年代从农校毕业后,陈德华就怀揣这个梦想。80年代初的一天,“陈德华在省茶科所工作的同学奉命来到武夷山,对大红袍进行剪枝试验,陈德华趁机向同学提出,想要一枝做试验,但因大红袍母树的枝条太珍贵,老同学只得婉言拒绝。之后,陈德华始终惦记着那支被移植的枝条生长的情况,五年后,历史的机缘最终成就了他的愿望。刚好1985年,陈德华有一个机会去参加福建省茶叶研究所成立40周年所庆,就要求他同学私下给他五根大红袍母树枝条。在陈德华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通过无性繁殖技术精心培育,这五棵珍贵的枝条全部成活了。”^[4]从此以后,大红袍开始了其生儿育女的崭新时期。从六棵到到十一棵,从几十棵到几千棵,从九龙窠的六株孤独母树到遍及武夷山的四万亩大红袍森林,二十多年时间过去,大红袍已经成为武夷茶种的至尊。无论数量和规模,还是品质或销售,其神一般的地位非其它茶树品种能够撼动。2006年,政府做出英明决定,对六株母树停采养护。由此,再也没人能享受到来自母树的茶叶,但是大红袍的精髓,那份岩骨花香,

却遗传和保留在了遍及武夷山的每一棵大红袍茶树之中。神树的神韵在大规模传播,神树依旧矗立于九龙窠的岩壁之上,见证了自己生命的蓬勃发展和延续。

图腾意义、神秘色彩、神圣意味、至尊地位,大红袍母树在武夷山乃至整个中华茶文化中都具有特殊意义。在正式宣布停采母树枝条及茶叶之后的2007年10月,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了一个特殊的收藏仪式,宣布将大红袍茶叶作为藏品收藏。一向只看重物重器的国家博物馆居然为几包茶叶折腰,这样的事实刷新了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记录。国家博物馆之所以破天荒这么去做,其实要表达的正是对于大红袍母树神圣地位的尊重。

明朝,一进京赶考的穷书生路过武夷山时,病倒在天心永乐禅寺,面色苍白,气息奄奄。天心永乐禅寺的僧侣扶危济困,救助了落魄书生。几碗茶汤灌下去,不一会儿书生就有了生气,没几日竟好了。这茶汤就来自于九龙窠岩壁上的茶叶。恢复活力的书生进京赶考竟金榜题名,高中状元。衣锦还乡之际感念好心的僧人和救命的大红袍,专门经停武夷山九龙窠,将状元红袍披于母树之上。故事不胫而走,九龙窠上的茶树从此有了“大红袍”的姓名。这个关于大红袍得名由来的传说在武夷山可谓家喻户晓。姑且不论传说的可靠性,我们在此传说中能明显感受到大红袍母树的无限灵性。当书生将状元大红袍盖在母树之上时,实际上宣示了一个神圣的加冕仪式,这六棵茶树也是茶树中的“状元”。如今,武夷山的大街小巷,村头镇尾,处处可见大红袍字样。在山水实景剧《印象大红袍》中,更是将这六棵母树的传说进行精彩演绎。而在异域殊方的超市货架上,印有大红袍字样的茶罐醒目无比。从传说到现实,从母树到子树,从茶树到茶叶,其中最值得尊敬和纪念的正是那六位茶树女神。

二、桐木村的茶祖地位

武夷山茶树种植文化基本地位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双星闪耀”。一星即上文所提大红袍茶树,它代表乌

龙茶、岩茶之巅峰和典范;一星为武夷山桐木村之正山小种茶树,它代表世界红茶之祖先与根脉。这两种茶树,构成武夷山茶树种植文化地位的核心内容。

武夷山桐木村成为红茶祖庭偶然当中体现着必然。桐木村也流传着动人的传说,这个传说同样发生在明朝。一天,一支来自北方的军队路过桐木村,天色已晚,山路难行,只好在当地宿营。这时,桐木村已经开始了半发酵乌龙茶的生产和制作。地头屋外的木板上铺满了正在晾晒的茶叶。士兵众多,疲惫不堪,就地取材,当夜就睡在了这些铺满茶叶的木板上。第二天部队继续行军,只留下被北方壮汉们压扁压烂的茶叶。当地茶农欲哭无泪,眼看着一年到手的收成将要变成垃圾。为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茶农们用松木枝条生火烤干被压烂的茶叶。松木的特殊清香融入到被压烂的、几乎提前全发酵的茶叶里,诞生了崭新的独特茶香。虽然当年那批茶叶被低价变卖,但第二年,喝过此茶的茶商小贩们都以高过乌龙茶数倍的价格来购买这种带有松木香全发酵的新茶。从此,“正山小种”红茶诞生,一个全新的茶叶类别横空出世,随后几百年它开始了周游列国、传播世界的行程,成为世界各地红茶的鼻祖。“正山”即桐木村所在地,“小种”即桐木村小株茶种。它的特点就是全发酵,茶汤红亮,口味带有松木清香。从这一传说可以窥见,红茶的诞生似乎是一种偶然情况,但其实偶然背后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在桐木村独特的茶树种植环境和独特的茶树品种与红茶口味的必然联系。

在整个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当中,桐木村海拔偏高,气候偏寒,植物生长相对缓慢。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桐木村独特的茶树品种——小种茶的生长。小种茶因茶树外观小巧低矮而得名,但恰恰因为小种茶生长周期偏长,茶叶口味更加独特。而且在桐木村,植被丰富,森林覆盖面积广,它处于九曲溪源头,生态环境保护好,土壤和水分污染少。独特的环境造就了小种茶树和茶叶过硬的品

质,所以即使是偶然性的事件导致了红茶的诞生,但这背后隐藏的却是桐木村绝佳生态环境所昭示的必然性。

桐木村红茶诞生后,一经跨国传播,便焕发出超强的活力,甚至改变了世界历史。公元1692年,英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汇,那就是bohea,其意思就是武夷红茶。因为闽南厦门人称呼武夷茶的方言发音就是bohea。这个词印证了英国人1689年首先靠近厦门港装运武夷红茶的历史。18世纪中叶,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将所有茶树分为两种,一为绿茶,一为武夷茶。这个分类法至今植物学界都在沿用。这两种史实足以说明来自桐木村的武夷红茶诞生之后对世界强大的影响力。正是这样的影响力,支撑着桐木村茶树种植活动的持续、发展与创新。

桐木村是世界红茶茶祖之地,同时也是世界茶树种植茶祖之地。走向世界各国的武夷茶种其中绝大部分茶苗茶种都来自桐木村一带。在离桐木村不远的大安源及岚谷一带,仍能找到野生茶树。它们的特点是:灌木型、小叶类、原始野生状态,被当地人称作“菜茶”。这些荒郊野外的丛丛“菜茶”,就是武夷菜茶的原始种群,它们正是世界茶树最重要的祖先,它们印证了桐木村一带悠久的野生茶树生长和人工种茶历史。据著名茶学家林馥泉20世纪40年代调查,当时菜茶栽培面积约占茶山面积的85%。由此可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菜茶都是武夷茶的种植基础。没有武夷菜茶,就不会产生武夷历史上形成的各类优质茶种。“武夷菜茶一般采用播种繁殖,由于茶树花粉的自然杂交容易产生变异,进而容易诞生新品种。如名丛大红袍、白鸡冠、铁罗汉、水金龟、半天妖等名茶均从武夷菜茶中选育出来。武夷菜茶植物学特征变异万千,其中蕴藏着无数优异的品种类型。武夷山种茶先民很早以前就开始选育优良茶树用于生产。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利用当地特有的茶树资源,选育出许多品质优异具有特色的武夷菜茶优良单株,单独繁殖栽培采制,反复对比选择,并冠以各种‘花名’,形成

许多名丛。经历了10多个世纪,武夷山共创出了名丛千余种。”^[5]因为上述原因,武夷山荣膺茶树“品种王国”之光荣。诸多名丛争奇斗艳,世代相传,提高了武夷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财富。由此,再结合茶树种植与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说桐木村一带的武夷菜茶为世界茶树品种之始祖,所言不虚。

三、武夷山的茶心地位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福建武夷山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茶树种植中心。武夷山就是一个种植元点,由此元点出发,茶树种植文化源源不断地向周边辐射,向世界延伸。在中国众多茶树种植基地中,没有哪一处对世界的影响有武夷山那么大,没有哪一处能形成“双星闪耀”的种植地位,没有哪一处能同时成为世界两大茶类(乌龙茶和红茶)的共同茶源,没有哪一处能同时连接起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并且成为其茶路起点,没有哪一处的茶树品种传播范围有如此之广。大红袍、桐木村、下梅村,这是世界茶叶种植史上绕不开的巨大文化符号。而整个武夷山,就是同时收纳这些巨大符号的世界茶心。

从区域范围来看,武夷山风景区是武夷山市的茶叶种植中心,武夷山市是产茶大省福建省的茶叶种植中心。从全国范围来看,武夷山是中国茶叶种植中心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种植中心。从世界范围来看,武夷山市是中国茶文化影响世界的重要元点,是中国茶树走向世界的关键起点,它无疑也是世界茶树种植文化的中心。

茶心地位其实也意味着武夷山茶树种群的胸襟和气度,武夷山茶树种群不仅积极走出去,还积极引进来;不仅自己培育大量新品种,也积极引进新品种。武夷山茶树种群历代选育的名丛众多,达到近千种,为中国乃至世界茶树品种培育做出了极大贡献。这些品种中包括当今的许多名牌茶品。如“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半天妖、肉桂、老君眉、不知春、洞宾茶、木瓜、雪梅、水红梅、素心兰、

白桃仁、雀舌、红梅、铁观音、金锁匙、白牡丹等。伴随发展的需要,从清末开始,武夷山逐步引进外地茶树品种,进行搭配种植,推进武夷山茶区从单一栽种武夷菜茶转向多品种栽种。在引进茶树品种主要遵循三项原则:一、引进无性系茶树品种为主;二、引进适宜制作乌龙茶的茶树品种;三是引进适合武夷山当地生长环境的茶树品种。”^[6]从清末到1949年,先后引进的品种主要有水仙、乌龙、梅占、佛手等。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引进的栽培品种主要有本山、桃仁、奇兰、福云6号、安徽楮叶种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进试验示范的新品种主要有八仙茶、凤凰单丛等以及福建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新选育的推广品种为茗科2号(105)、茗科1号(204)、丹桂(304)、黄奇等以及台湾品种台茶12(金萱)、台茶13(翠玉)等。丰富多样的茶树品种,一方面烘托着武夷山正山小种、大红袍等茶品的至尊地位,另一方面又蕴育着新品牌诞生的无限可能。武夷山就在继承与发扬、保护与开发、坚守与创新的辩证法中继续千年不衰的茶叶种植文化,保持其茶神、茶祖、茶心之地位。

参考文献:

- [1]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 [2]俞为洁.中国史前植物考古 史前人文植物散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3]蒋叔南.蒋叔南游记[M].卢礼阳,编校.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出版社,2011.
- [4]中国茶王网.陈德华谈大红袍的前世今生[DB/OL].(2012-12-15).[2014-08-06].<http://chawang.cn/xinwen/3939.html>.
- [5]林茶网.罗盛才.武夷山茶树的来源及种类[EB/OL].(2011-02-08).[2014-08-06].<http://www.lincha.com/Chaye/wuyishan-tea-variety-756.shtml>.
- [6]福建茶叶网.武夷山茶树种专题体系[EB/OL].<http://fjtea.my.pp.cc/detail/14180.htm>.

作者简介:张经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专业2013级在读博士,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